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第1期

2007年5月28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编者按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于2007年5月18日正式成立。本简报亦从这一期开始，正式创刊。首期特别发表中央外办裘援平副主任对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工作的指导性意见。她对国内该领域研究状况的分析洞若观火，提出的希望殷切而现实，值得细细品味，认真领会。

关于国际战略研究的几点看法 ——在北大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成立会上的发言

中央外办副主任 裘援平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牵头成立北大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又以“促进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为题举办研讨会，下一步还要在研究中心的基础上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一系列的策划和动议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成立，可以为学养深厚、学科齐全、人才荟萃的北大在国际关系领域搭建起教学与科研、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之间更广阔的交流和合作平台，从而更充分地利用校内外各种资源，促进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科建设、战略研究、学术地位和人才培养的整体提



升。另一方面，国际战略研究这个切入点选得好，“促进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这个主题也太重要了，它正是国家发展进程所呼唤的，是整体对外工作所急需的，甚至是刻不容缓的。结合我在实际工作中的感受，简要讲三点个人看法和建议。

一、我国正处于极为关键的发展阶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国际战略研究。国际战略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可以罗列很多，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国家快速发展的迫切需要。

第一，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的发展及其产生的内外效应突破了某种临界点。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过渡期的结束为显著标志，中国加速发展的扩散性影响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质的变化开始真切地显露出来。这种变化反映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变为在世界统一大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局面，与世界经济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及全球最具潜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之一。其次是我国广泛参与全球和地区事务及各领域的国际合作，从国际体系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合作者和建设者，享有的国际权利和承担的责任义务日益扩大。再次是我国综合国力有了质的飞跃，从资本积累阶段跨入经济起飞阶段，发展的内外效应、溢出效应和海外利益迅速拓展，与原有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利益格局的交融、碰撞、挤压都在增强，从与世无争、国际影响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变为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的新兴大国。

我们可以把上述发展变化归纳为中国国际角色的三大转变。由此，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互动关系以及国家振兴的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历史性

的变化。中国在涉外领域面临的问题从常规发展中的问题上升为了急速兴起中的问题，其性质、内容、程度和影响等都更加复杂。靠被动反应式外交、事务性处理以及传统观念和惯性思维显然已经不够了。

第二，我国现代化建设正处在关键而敏感的发展时期，处于几个进程同步推进的历史关口。国家的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民主化、国际化在同步推进，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利益关系变动等相互交织，同时又面临在全面开放条件下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巨大外部压力。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因素和外部条件的影响与制约。一些领域国际化程度的逐步提升，有可能成为中国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引擎。在中国社会深刻变革和世界格局复杂变动的交汇时期和高风险阶段，国内和国际的发展和环境的联系互动增强，各种结构性和整体性矛盾错综复杂。国家迫切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特别是强化对两个大局互动关系中规律的认识，以国际战略眼光和宏观战略思维，在全局上加以把握和运筹。

第三，我国具有多重属性，面临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大国所共有及中国所特有的多重安全和发展难题，国家的快速兴起又进一步产生了新的问题。很多问题需要在全局和战略层面上加以筹划。例如，在冷战思维长期存在、强权政治压力不减的国际战略环境中，我们必须加以反制，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政治安全；台湾问题始终危及国家领土完整，牵制和平发展进程；周边的不稳定和地区格局的不确定因素直接影响我国外部安全和发展环境；实现现代化所需能源和其他资源的供需矛盾不断显现，获取海外资源及保障供应和运输安全的任务加重。

由此可见，我国快速发展的外部阻力很大。如果盲目发展，带来的危



害更大。因此，需要主动营造宽松有利的战略环境和稳定发展的大国关系，需要更加睿智地参与全球竞争和发展软硬国力，需要创新对外工作和国际合作的方式，需要努力减少和化解外部干扰和阻力，确保国家顺顺当当地实现和平发展，力所能及地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总体看，靠有限的外交资源和地域性布局只能维持对外关系的总体稳定，还不足以实现既维护又扩展国家利益的多重战略，不足以抗衡和消除迟滞中国发展的多方面挑战，不足以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秩序建构中发挥长期有效的作用，更不足以适应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更高要求。因此，深谋远虑地加强战略研究和更大范围的科学运筹，显得特别重要而又紧迫。

第四，我国对外交流和对外工作呈现全面发展的局面，从主体到客体、形式到内涵、广度到深度，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大外交、大外事、大安全和大开放的格局。认识不到这几个“大”，就无法超越传统的思维定式和各方面的局限性。就外交而言，代表国家行使对外职能的行为主体已从单一外交机构扩展到中央政府的许多部门，从侧重政治关系到扩展及各个领域，已不能片面强调外交的政治属性了。就外事概念而言，几乎没有哪个领域和部门没有涉外工作和对外交往活动。就国家安全而言，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早已打破了传统安全的局限。就对外开放而言，中国开始从“引进来”为主的国际化发展阶段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全球化发展方向转型。国家利益的多元化、各方面诉求的多样化以及内外安全与发展环境的复杂化，对宏观研究、综合判断、总体规划、统筹协调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需要超越传统的外交、外事、安全和开放的范畴，需要足够高和足够宽的内外战略大视野。

二、国际战略研究贵在知行合一，要立足于为国家实现和平发展提供

智力支撑。

所谓国际战略研究，既可以是具有全局性、综合性和长远影响的战略问题研究，也可以是涉外领域的全局和长远谋划；既可以是学理性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也可以是实证性的战略策略研究和谋划。我们国家有丰富的战略思想和很强的战略意识，但在对外领域缺少战略层面上与时俱进的实证研究、对策研究和规划性研究，在系统化和精细化两个方向上都有很多空白和欠缺。我们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要加强为国家发展和中央决策服务的应用性战略研究。我一直感觉到，外交乃至对外工作长远考虑不够，学术研究、政策研究和外交实践长期不能对接，中国外交学科建设远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一线专业适用人才匮乏。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一定程度上都与实证类国际战略研究和相关人才培养使用环节薄弱相关，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加以改进。

国际战略研究看似不难，涉足这个层面研究的不乏其人和著述。但是，要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搭建起由此及彼的有效桥梁，要有经得起实践无情检验的有指导作用的研究成果，其实是很难的。既需要相关理论和知识素养，需要宏观战略思维能力，需要对实际工作的了解和经验，还需要认识国情以及国内政治文化和运作规律，知道古今中外什么样的理论和思想在中国行得通，以及如何才能把理论和思想通过战略层面的设计转化为对外工作的行动力和生产力。因此，确实需要兼顾专家学者和外交外事干部双重素质及能力的人才培养制度。

在现有条件下，外事职能部门应该高度重视战略研究和长远筹划，既要有人在干事，也要有人在谋事、会谋事。要积极探索与科研院所密切交流合作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将专家学者与职能部门的各自优势结合起来。



职能部门也要不断拓宽干部来源，优化干部结构，更多任用具有战略思维能力和理论知识素养的人才。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对于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教育，除了基础理论和历史研究外，建议考虑加大战略研究的分量，推出战略研究成果。

在加强学术研究的同时，需要更加重视实证研究，更多遵循战略研究的属性和内在要求。一是要坚持实践性。战略研究是把握并运用规律和谋略的智慧与艺术，是属于行为科学和应用科学范畴的，其价值和生命力应该在于指导实践的有效性。它必须植根于现实、服务于实践，其成果价值需要通过实效来检验。脱离外交工作和国内国际实际，再能自圆其说的成果都很难有社会价值，弄不好还会误国误民。二是要体现政治性。我们讲的国际大战略的行为主体是国家，本质上是政治和政策上的选择，所以需要始终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而不是以主观臆断和自说自话为逻辑起点和终点。当然，对国家利益要有更完整的理解，其中包括要顾及别国利益，并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在方法论上，也有一个与国内政治文化甚至语言习惯相适应的问题。战略源流和实施主体如果发生错位，往往产生相反的效果。三是具有综合性。国际战略研究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前沿，需要国内国际宽广领域的大视野，往往是跨学科跨领域的整体性思考。在我国国际战略研究还很薄弱，特别是实证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时，绝不能固守学科界限或拘泥于学术规范，而要结合国情和实际大胆创新，并善于继承和借鉴古今中外各学科有益的经验 and 成果。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性和方法论的争论，关于能不能形成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学科的发展。如果各方面能在一些基本方面形成某种共识和合力，可能会产生更多具有社会效益的战略研究成果，为国家发展和

对外工作提供更有力的智力支持。服务于中国国家利益、植根于强国外交实践的国际战略研究的新拓展，完全有可能为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打上中国特色的烙印，提高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三、对办好北大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几点期待。

第一，希望能抓住机遇。去年8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为适应国家快速发展的需要，要加强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学科的建设，加强对外战略研究，积极培育为国家发展和中央决策服务的智库。有关方面都在结合自己的职责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北大成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是集这三项任务于一体的举措，应考虑如何将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整体提升学科建设、战略研究、学术地位和人才培养水平。

第二，希望能突出重点。战略研究的角度和课题很多，为避免流于一般和空泛，要办出特色和档次，使研究的课题真正是国家所需要的，国际上感兴趣的，并能吸引各界精英参与的。这就需要在多样化基础上适当聚焦。例如，能不能组织一点力量扎实研究中国如何打破世界历史定律，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以及如何确保这条道路走得通和走得稳当？这是个具有挑战性的世界性课题，也是能将学科建设、战略研究和智库培育三项任务有机结合起来的抓手，还是国家需要的、国际战略学界和社会各界感兴趣的内容，值得倾力投入。在理论研究上，能不能促进形成一套符合客观规律、适用于对外关系领域、较系统的国际战略研究的应用理论和方法论？在史料整理上，能不能有针对性地进一步加强古今中外各种文韬武略的汇编，以及对各国国际战略和对华战略的评介？在课题研究上，应尽可能以国家对外应该怎么做而不仅是怎么说为重点，回答一个快速兴起的国家的国际战略应该回答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



第三，希望形成合力。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对美国战略文化的发达、战略思维的灵敏和战略运筹的超前颇有感触，也一直期待着在自己的国际问题研究和对外工作领域，能够改变学术研究、政策研究和实际工作相互脱节的状况，能够形成产学研紧密结合、良性循环的局面，从而能够为国家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做到这点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形势的发展和国家的需要时不我待。在座的大都是国际政治学科的领军人物及资深教授和专家学者。希望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和各对外工作部门能加强沟通、密切交流、深化合作，共同探讨并努力推动相关建设。这个研究中心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平台，衷心祝愿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把中心办成办好办出成效。